

叶嘉莹·著

唐宋词十七讲

生活书店

责任编辑 潘运告
书名题字 缪钺
封面设计 钱君匋
胡颖

5/5
唐宋词十七讲

叶嘉莹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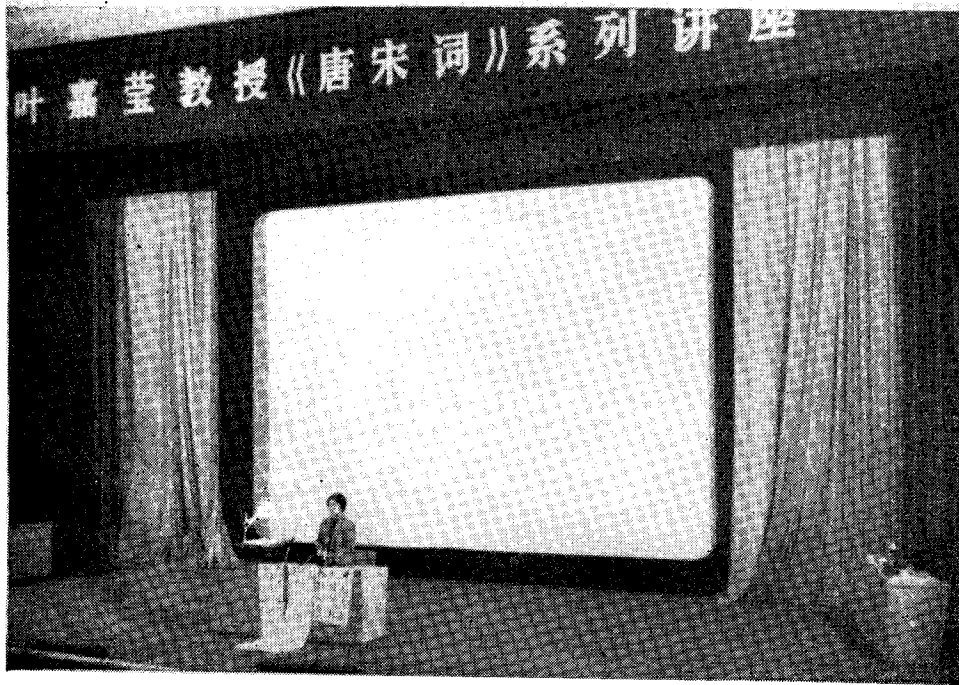
198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410,000 印张: 16.75 印数: 1——8,200

ISBN 7-80520-138-2/I·79

定价: (平) 4.95 元 (精) 6.80 元

〔湘岳88—8—5/6〕



叶嘉莹教授讲学的情景

史树清弁言

与迦陵别三十年，一九七四年春夏之交，余初访加拿大，始遇于渥大华驻加使馆席上，握手道故，快同平生。时值中加邦交之建，迦陵倾谈之际，尝诵杜甫《秋兴》诗“每依北斗望京华”句，以寄深怀故国之思。

同年暑期，迦陵欣然回国，省视亲旧，历览山川。昔日同学，半皆华发，而相聚之乐，无异当年。荷赠所著名篇，知学与日进，道与年增，不负师门教诲，为可敬耳。自一九七九年以来，迦陵应聘归国讲学，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十数所大学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多方引发体现在诗词中中华民族文化意识、道德观念，知迦陵涵濡于此者甚深，用心尤堪感佩。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迦陵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之支持与赞助，与四川大学缪彦威教授鉞合撰《灵谿词说》，列为中加文化交流科研项目。一九八六年，迦陵应聘为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并被多所大学聘为名誉及客座教授。

《唐宋词十七讲》为一九八七年迦陵应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老干部协会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

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之讲演记录。讲座先后在北京、沈阳、大连举行。北京十讲，皆获亲聆，而后八讲，以公职在身，未能远赴，为之惆怅无已。以余所闻，三地听众无不钦佩迦陵学养之深醇与对诗词评赏之精辟，言辞清隽，含英咀华，既能深探词人之用心，又能兼顾纵横之联系。迦陵尝谓：“词之为体，自有其特质所形成之一种境界。”并引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曾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诸语，谓词中所表现者，常是比诗更为深婉含蕴之一种情思和境界，更需要读者之细心吟味，方能有深入之体会。由于迦陵长期从事诗词创作，更参以东西方文论之比较研究，本此宗旨，故论词能博览今古，融贯中西，独造精微，自成体系。所讲唐宋名篇，确有不少真知灼见，足以启迪读者，濬发妙悟灵思。

闻尝论之，迦陵于诗词造诣之深，盖根于天性，幼承庭训，读唐宋人诗，便有意于创作。其后，读书辅仁大学，受业于清河顾羨季先生随，盐城孙蜀丞先生人和，为学日进，得益良多。壮岁远涉重洋，胸怀日阔，寄理想之追求，标高寒于远境，伤时感事，写物抒情，称心而言，不假雕饰，要眇馨逸，情词深邈。而亦兼有清壮矫健，气骨坚苍之作，缪彦威教授尝称其所作，谓云“独能发英气于灵襟，具异量之双美”，良非虚誉也。

迦陵在校读书，尝谓羨季先生授课最大特色在于启发，凡书本所有者，学生可自阅读，而讲授者应是以自己之博学敏感和深思，并由于创造经验之丰富，能体会和掌握诗歌真正生命与妙涵，用多种譬喻与例证，将生命与妙涵作最细致和最生动之传达。迦陵之教学与科研即循此前进，硕果累累，并非偶然。

余与迦陵在校同受业于顾羨季先生，近读《顾随文集》所附《驼庵诗话》，知为羨师课堂口讲，迦陵所笔受者，积稿八册，都十万

言。三十年来，迦陵生活几经颠沛，贵重物品，或弃或失，而此笔记，珍藏什袭，迄未去身。即此一端，尔可见迦陵自幼读书治学之勤勉与师生情谊之深挚。此种珍爱祖国文化、重道尊师之美德，尤足为今日青年之所矜式。

今迦陵《唐宋词十七讲》即将印行问世，读之者，可以温故，可以知新，对古典诗词之学习与评赏，定可藉此而获得更多之感悟和启发，辅仁大学校友会及中华诗词学会以余与迦陵同门受业，相知之深，非同寻常，《十七讲》出版，应有一言为介，不敢固辞，乃掇集讲座席上种种遐想，作为与广大读者之谈助，成此短文，以玷佛首。迦陵自来著书，不请人题序，于此其首肯乎！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学弟史树青谨书于北京东城竹影书屋。

自序

这一册讲唐宋词的录音整理稿之得以出版与读者们相见，可以说主要盖皆出于一些热爱古典诗词之友人们的鼓励和协助。因此我想在卷首略述其成书之经过，以表示对友人们的深挚的感谢。

原来我在一九八六年间曾先后返国二次。第一次在四月中。此次返国之主要目的，原是为了前往四川大学与缪钺教授共同商订我们所合撰的《灵溪词说》一书的定稿及出版事宜。途经北京时，偶因同门学姊北师大杨敏如教授之邀请，曾在北师大做了一次有关唐宋词的报告。当时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马英林学长适在座中，事后马学长遂与我商议，要我于十月中辅大校友聚会时为校友也做一次报告。我想身为校友，此自属义不容辞之事，遂欣然允诺。七月初，我又因美国奥立根大学东亚系之邀请，曾一度赴美讲学。八月底再度返回中国。此次返国是因我于八月以后有一年休假，事先已应允了国内复旦、南开、南京、四川、兰州及湘潭几所大学的邀请，从事讲学及科研活动。抵京后不久，有中华诗词学会周一萍及张璋诸先生先后来访，邀我参加九月初在京举行之诗词学会的座谈会，并于会后提出要我也为该会做一次报告的邀请。我因以后讲学之行程多已排定，实难更做安插，遂提

出请诗词学会与辅大校友会联系,或者可以将两次报告合并举行。其后我即离京赴沪,先在上海复旦大学讲课,九月底又转往天津南开大学讲课,十月上旬我又利用一个周末自天津赶返北京参加在京举行之辅大校友会。但因时间不及安排,并未能为校友会及诗词学会做任何有关诗词之报告。于是马英林学长遂又提出希望我能于春节假期返京时多做几次报告的要求。我当时表示或可做四至五次报告但不可再多。随即返回天津仍在南开继续讲课。岂意自我返回天津后,北京方面乃又有国家教委会老干部协会及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相继加入了此一讲座的筹办工作。并由马英林学长与我联系,提出欲将此一讲座安排为系列之形式,对唐五代及两宋词做系统之介绍。我因自知时间及能力有限,对此一要求最初本不敢贸然允诺。但马学长以中文系前辈校友之关系,曾多次对我以发扬古典诗词之理想相劝说,最后我只好勉力答应了此一邀请。于是主办单位遂又提出了要我编选教材的要求,而我当时一方面既在南开大学授课,另一方面还在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撰写《迦陵随笔》,又为《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撰写《王沂孙评传》一篇文稿,工作实极为忙碌,仓促间只编选了一组词目并复印了一些参考资料经邮寄往北京。后由李宏学长将所选各词及参考资料分别抄录整理,幸而能于春节期间由印刷厂赶印出来。于是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遂于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也就是旧年丁卯新正月初六日,在北京国家教委会礼堂正式开始。我当时在染患有轻微感冒,且曾于不久前在天津火车站前跌伤腰部,加之工作一直极为忙碌,对此系列讲座乃全然未暇做任何准备。不过,骑虎之势已成,遂不得不勉强开讲。岂意爱好诗词之广大听众对此一讲座之反应竟极为热烈,因此在讲座结束后,主办人遂又提出了要将此一讲座之录相及录音全部整理出版的计划。当时幸蒙李

宏学长又热心答应了整理此一系列讲座全部录音讲稿的工作，于是我遂又返回了天津，仍在南开继续讲课。在此期间，北京之辅大校友会常拜托一何姓女同志将李宏学长整理好的稿件送来天津交我审读。直至四月下旬，我又自天津转往南京大学讲课，于是审稿之工作遂暂时停止。迨五月底，我又自南京返回北京，在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时，得与岳麓书社的胡遐之先生相识。胡先生闻知有此一讲稿正在整理中，遂积极与主办此一讲座之负责人联系，决定由岳麓出版此册讲稿。不过，我在北京的讲座，因时间关系实在只讲到了北宋后期的周邦彦，而南宋词则全然未及讲到。此时乃又有沈阳校友会之赵钟玉学长提出了要我去沈阳续讲南宋词的邀请。本来我此次休假一年返国讲学的活动已早经排定，实无法再增入任何讲课活动，故尔对赵学长邀请之盛意，我原曾多次婉拒。岂意赵学长乃锲而不舍，先后自沈阳专程来京、津两地邀请竟多达五次以上。最后又请得北京讲座主办人中之马英林学长与之共同来对我加以劝说，一力主张既已举办了唐宋词系列讲座，便应将南宋词一气讲毕，俾能将录相及录音一次整理出来以便发表，于是我遂不得不分别致函湘潭及兰州两大学，请求他们的谅解，将原订之讲课活动取消，而于六月下旬在四川大学讲课结束后，即由成都去了沈阳。而一到沈阳，我就发现自己面临了一个绝大的难题，因为按预定计划，我来沈之目的原是为了续讲南宋词，可是沈阳之听众都已经不是北京前次讲座的听众，而且南宋词又一向以深晦著称，如果对全无准备的听众，一开始就讲述如此深晦的作品，则势将使听众们感到格格难入。因此遂决定再对五代北宋词稍加介绍，可是此一部分又在北京早已讲过，因此在去取剪裁之际，乃不免煞费周章。而在此同时又有编辑北京讲座录相之许宪同志自北京携录相来交我审视。因此我遂开始

了接连不断的紧张工作，每天上午早餐后即开始审查录相，至午餐时间为止，下午外出讲课，晚餐后又开始审查录相工作，往往至夜晚十时半以后才停止。此外我还要在这些紧张工作的间隔空隙间，例如在餐厅等候饭菜之时或晚间睡眠之前，抓紧时间审读已整理出来而尚未审毕的北京讲座的录音稿，而就在此时，又有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的饶浩学长不断与沈阳化工学院的赵钟玉学长联系，坚持要邀我至大连一行。当时我所讲的南宋词，尚有最后一家王沂孙未讲，遂又于七月初转往大连接讲王沂孙的咏物词。而大连既然又是另一批新的听众，王沂孙又是一向以晦涩著称最为难讲的一位作者，这种情况确实给我增加了不少困难。而为了使听众较易接受起见，我遂不得不对咏物之作的渊源又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而这也就正是何以在这一册讲稿中王沂孙所占的篇幅为独多的缘故。象这样把一个名为系列的讲座，被迫着不得不拆散开来对不同时地的陌生听众来讲，其效果之不能尽如理想，自亦从而可知，何况在大连除讲课外，尚须同时审查在沈阳大连两地讲课的录相，因此每日自晨及夜仍是忙碌异常。而除去这些已排定的工作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完全由我自己利用一切可能时间来工作的，就是审查北京、沈阳、大连三地陆续整理出来的讲稿，也就是这一册《唐宋词十七讲》的最初底稿。

说到此一册录音讲稿，我自然首先要感谢为我整理讲稿的诸位友人，那就是北京的李宏先生，沈阳的李俊山先生及王春两先生，还有大连的张高宽先生。当时因为岳麓书社曾要求我于八月返回加拿大前交稿，时间极为迫促，所以使得每一位为我整理讲稿的友人，都工作得极为紧张。我原意以为只要整理出来应该很快便可以全部审订，谁知实际工作起来都不如此简单，因此虽然有诸位友人们付上了如此繁忙辛苦的劳动，但我却仍然未能如期

交稿，这自然主要都怪我自己很多事做得不够周到的缘故。其一就是我平生讲课一向不在事前准备讲稿，可是一旦讲起来喜欢因即兴的感发而征引许多材料来对所讲的内容加以阐发，此在平时讲课言之，即使所征引者偶有失误，总是说过就算了，尚复无伤大体。然而现在既要审定加以出版，遂迫使我在审稿时还要尽力为之核对出处，这自然是增加了审稿之困难第一点原因。其次则是我自己讲课的语言不够简洁，既常不免重复，又喜欢跑野马。何况口语的讲述与行文的笔法毕竟不能全同，有些话在讲述时显得很自然，但一写下来就感到不对了。于是为我整理讲稿的友人们，对此一困难遂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完全忠实于我原来讲话的声吻，把我当时所讲的话一字不改的写下来；另一种态度则是欲求行文之通畅简明，遂将原来的讲话重新删裁改写。我对这两种态度的用意之美，都极为感谢。只是天下之事总是有一利即有一弊。前者忠实，遂不免有繁复啰嗦之感；后者简净，但有时却不免有不够周全之处。而我在审稿时，遂一一要为之删繁使简或增略使详。这自然是增加了审稿之困难的又一点原因。三则我在沈阳及大连两地讲授南宋词时，既时时不得不对以前北京已讲过的五代及北宋词重加介绍和说明，而今却又将三地之所讲都编为一集，如此则对某些重复之处自需重加删订，这自然是增加了审稿之困难的再一点原因。而除去了由我自己本身所造成的这些困难以外，还有一点我不得不很感慨地提出来一说的，就是南宋词的最后一部分讲稿的整理，当时因时间已甚为紧迫，遂由负责整理的友人找了一些中文系的同学来加以协助，岂意这些同学们对古典文学竟甚为生疏，甚至将词牌之《齐天乐》误写为《七天日》，将李璟词的“菡萏香消”误写为“含淡香消”，将厉鹗《论词绝句》中的“残蝉身世香萼兴”一句误写为“潺潺山寺香春兴”。

象这一类的错误简直不胜枚举，而事实上我在讲课时凡此一类的行文，本都用投影仪写有胶片字幕。而且《齐天乐》的词牌与李璟的词句更是分明都印写在参考资料之中的，所以我至今仍不明白这些学生何以在整理讲稿时竟发生了这么多如此荒唐的错误。而这自然使我在审稿时增加极大的困难。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对沈阳的李俊山先生再加以特别的感谢，因为这一部分文稿实不仅错误百出而且书法也写得极为了草零乱，加之我在审订时又几乎重写了一遍，所以原稿乃杂乱到几乎不复可以辨读的地步，幸得李俊山先生极为热心，在挥汗如雨的炎热天气中又将此一部分稿件重新抄写了一遍，只是我当时已来不及再将全部文稿通读审订，就因为去年我自己在加拿大购买的一年期的往返机票已经到期，而不得不匆促返回了加拿大。并将南宋词部分的讲稿带回温哥华做最后的审订。然后又于八七年底将审订后的此部分稿件再托人携往北京交给另一位好友对全部讲稿做最后通审。这一位好友就是我从中学直到大学的多年同学刘在昭学长。在昭学长自中学时便已才华颖露，文笔及书法均佳。临离京前，她来为我送行，我与她谈到审订这些讲稿的问题，恐怕我自己匆迫中终不免有疏误之处。乃蒙其慨然允诺愿为我将全部讲稿做最后一次通审，这自然是我特别加以感谢的。此外还有一位学长我也应加以感谢的，那就是与我在辅大中文系曾同学四年之久的史树青学长。树青学长自少年时候潜心研古，现已为国内著名考古学者，我在北京举办唐宋词讲座时，树青学长不仅每次均亲来听讲，并曾对我提出有关古文物之宝贵意见，今又蒙其赐序弁首，这自然是我应该深加感谢的。至于我在本文前面所曾提及的先后促成和筹办此一讲座的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沈阳化工学院、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及各

地各单位支持此一讲座的广大的爱好古典诗词的友人们，我当然更要在对此之深致感谢之意。

经过以上的叙述，读者们对于此一册讲稿之成书的曲折和复杂的经过，大概已有了相当的了解，而也正惟其因为有如此一段曲折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虽然对各位协助成书的友人们深怀感谢之心，可是就我自己而言，则却一直对此一册讲稿感到未尽满意。那就是因为此一册讲稿在名义上虽然是属于一个所谓“系列”的讲座，但实际上却都是匆促之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面对不同的听众，而且是经过不同的人整理而完成的。因此无论在文字方面或内容方面遂都不免有一种不甚浑融的感觉。关于文字方面，则事已如此，实难再加挽救，当然只好任之而已。至于在内容方面，则我在当初陆续讲述中，却也曾形成了一些主要的纲领，虽然因为外在环境的一些曲折的经过，使得这些纲领已经被打散得七零八落，但我想如果能在此卷首略做提挈的说明，则或者也尚可聊收补救之功。因此下面我就将对这些纲领略加叙述。

我在讲述中所形成的纲领，约言之大概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在介绍每一位作者时，都特别注意其风格之特色与其所传达的感情之品质的差别。因为词在早期本多为应歌之作，所以有其表面观之似乎殊少差别，因此我以为词的讲述乃特别应注意其相似而实不同的深微之意境与风格的差别。我所讲过的唐五代两宋之重要词人，计共有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十五家，对这十五位作者，我都曾结合了他们的历史背景，生平经历，性格学养，写作艺术各方面，对其能感之与能写之两方面的因素，做过较详的掌握其特点的叙述。此其一，

第二个重点是对词之演进和发展之过程的介绍。我在讲授每一家的作品之际，于叙述其个别的风格特色之时，也同时都兼顾了他们在纵向与横向之间的影响和关系，即如冯延巳对于晏殊及欧阳修之影响，以及三家词之异同；柳永词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拓展，及其对苏轼与周邦彦之影响；苏词对辛弃疾的影响，以及苏、辛二家词之异同；周邦彦对南宋之姜夔及吴文英诸人之影响，以及周、姜、吴三家词之异同；王沂孙咏物词之特色，及其在整个咏物之传统中的地位。凡此种种，在讲述时虽因某些外在之因素，有讲得不够周全不尽合乎理想之处，但大体言之，其发展之主线及彼此间相互之关系，也还是相当清晰可辨的。此其二；第三个重点是对词之特质及传统词评中两种重要模式的介绍。关于词之特质，我在讲座一开始时，就已曾就词之源起对其要眇宜修的特质做了简单的说明。至于就词之评说而言，则我在讲说中也曾举出了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重要模式。一般而言，我以为张惠言之说词大多乃是仍据所说之词中的一些语言辞汇做比附的猜测；而王国维之说词则是依据所说之词中的一些感发之本质做联想的发挥。张氏之评词方式适用于象对温庭筠、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人之词的评说，而王氏之评词方式则适用于象对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欧阳修诸人之词的评说。这两种说词方式，当然可以说都是对词之要眇宜修之特质的欣赏有得之言。而此外却还有一类词，则是既不需要据辞汇为比附，也不需要用联想来发挥，而本身就具有一种要眇深微之美者；此就婉约一派之作者言之，则如冯延巳之《抛球乐》（逐胜归来雨未晴）一首，秦观之《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一首，均可做为例证；而就豪放一派之作者言之，则如苏轼之《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一首，辛弃疾之《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一首，也都可

做为例证。关于这几类不同性质的词，我在讲说中都曾做过相当的分析，读者自可依此纲领而寻见其脉络。此其三；第四个重点则是我在讲说中也曾结合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如语言学中语序轴与联想轴之二轴说，诠释学中的诠释的循环之说，符号学中的语码之说与显微结构之说，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之创造性背离之说与文本中所蕴含的可能潜力之说等。我这样做的缘故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大多重直感而缺少理论的逻辑，因此我在讲述时遂往往借用一些西方理论，希望借此可以帮助我对传统批评之精义，做出更好的论说和分析；其次则是因为在现在的开放政策下，青年们中间已经涌现了一股向西方追求新知的热潮，而古典文学的研讨和教学似乎也已陷入了一种不求新不足以自存的地步，我在讲述中之偶或引用一些西方理论，就正是想要以世界文化历史之大座标为背景，对我国古典文学之意义与价值做一点反思性之衡量的尝试。此其四；第五个重点我所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贯串于此一册讲稿之中的一个整体性的特色，那就是我在讲授诸家之作品时，所冀望能传达出来的一种感发的力量。本来我对诗歌的评赏，一向就主张应该以其所传达出来的感发发生命之有无多少大小厚薄为衡量其高下之标准。只不过当我执笔为文之际，常不免过于重视思辨的理论，有时遂不免因而削减了对作品中感发生命之直接的传述和发挥，而此次讲座之举办，其地点所在之国家教委礼堂既是一个可以容纳一千数百人的极大的场所，而听众则更是包含了社会上各阶层各年龄的人士。上至六、七十岁的老诗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与社会青年，在程度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在这种场合中，我一方面既唯恐讲得过于专门，过于学术化会影响一般听众的了解和兴趣，而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能讲得比较精致深入，不致辜负了那些对旧诗词有修养

的听众们的期望，遂不得不在求精与求深的同时，也希望能求其尽量做到大众化。而要想同时达到此两种目的，我以为只有从发挥作品的感发力量入手，才能使广大的听众们经由感发而一同进入精深微婉的词境中来。而这一条以感发力量为主而贯串在全部讲授过程之中的主线，读者们自可以在阅读此一册讲稿时，从我的讲授方式与讲授口吻中，随时感受得到，此其五。如果读者们能掌握以上所提出的五项重要纲领，则在阅读时自不难在庞杂繁冗的讲述中为之归纳出一个相当清晰的条理，而获致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因略做简单之说明如上。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对于我个人之所以不自量力，不辞辛苦，而且在并无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承担了此一工作繁重的唐宋词系列讲座的心理因素，也略加剖述。我自总角学诗迄今，盖已有五十余年以上之久，自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后担任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也已有四十余年以上之久，因此遂养成了我对古典诗歌的一份深厚的感情。本来这种感情的性质原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兴趣与爱好而已，但自七九年我开始回国教书以来，却在内心中逐渐产生了一种要对古典诗歌尽到传承之责任的使命感。虽然我也自知学识浅薄，国内固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这传承的责任原落不到我的头上来，但却正如杜甫诗中所云“方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对古典诗歌似乎也就正有这样一种不能自己之情，因此我在当时还曾写有一首诗，说“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中屈杜魂”。诗虽不好，但所写的却是我自己的一份真诚的感情。可能也许正因为我有这样一种感情，因此对于这次的讲座的邀请，在最初我虽然因自恐能力有所不足而迟迟不敢应承，但却终于接受了下来，而且在讲授时也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有

一些关怀我的友人，在听过我的讲课后，常常劝告我说不要讲得声音太大，语调太急，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自己的身体。对这些叮嘱我非常感谢。每次讲课开始前，我也常以这些叮嘱自我警告，但是只要一讲起来，我就会不自觉地完全投入到诗词的境界之中，而把这些叮嘱全都忘记了。就以这一次讲座而言，大概就因为讲课过于劳累之故，从北京的十讲结束以后不久，我就在痰中发现了血丝。当时我曾先后在南开大学的医务所，南京的江苏省立医院，沈阳的解放军二〇二医院，和大连的铁路医院治疗过，照过X光片，也验过血痰，但因一直未发现结核或癌症的病变，因此我的讲课工作也仍然一直继续而未曾停止。如果有人观看我的讲课录相带，就会发现我在讲课中时有微咳的现象，而我讲课的语调却并未曾因此而降低或减慢。幸而自我回到温哥华以后，因为工作较轻得到休息，这痰中带血的现象自去年十月以后已根本消失。我愿在此向关怀我的朋友和医生们告慰并致感谢之意。我现在述及此事，只是想要说明我之不自量力竟尔承担了此一系讲座的繁重工作，盖原出于我对古典诗歌的一份真挚的感情。以前我的老师顾羨季先生常喜欢提到一句话，说“余虽不敏，然余诚矣”，如今我之所为，究其用心盖亦不过如是而已。

现在值此《唐宋词十七讲》的录音整理稿即将面世之际，我自己虽然对此一册讲稿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然而我的女儿言慧却曾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原来我在去年圣诞节前后，曾赴渥太华去探望他们一家，随身携带了一部分正在审阅中的讲稿，当时他们家中住有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见到了这些讲稿，就借去阅读。我原以为她是一个学理工的学生，对这些唐宋词的讲稿未必感觉兴趣，谁知他竟然读得津津有味，而且还把这些讲稿介绍给另外一些中国留学生去阅读。直到我临走前的一夜，她们竟然读了一个